



源远流长特质鲜明的荆楚文化

□ 李银安

公元1170年9月,爱国诗人陆游在荆州写了一首诗《哀郢》:“远接商周祚最长,北盟齐晋势争强。章华歌舞终萧瑟,云梦风烟旧莽苍。草合故宫惟雁起,盗穿荒冢有狐藏。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诗人对楚国及其楚文化的兴衰深切缅怀,充满忆颂和忧叹。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指出:“荆楚文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充分肯定源远流长、特质鲜明的荆楚文化,并寄予其复兴东方文明的厚望。追昔抚今瞩远,认识、传承、建设和弘扬荆楚文化,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伟大复兴,举足轻重、意义重大。

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厚实丰硕、步履铿锵

江汉朝宗的荆楚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炎帝神农故里,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楚文化发祥地、三国文化重要发生地、辛亥首义文化策源地、红色革命文化富集地、中国南北文化交汇地,在当代,湖北更是国家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基地。荆楚文化是湖北文化的代称,其空间范围大致以湖北行政区划为界,时间范围从远古至当今,之所以称为荆楚文化,是因为源头楚文化以荆楚大地为中心而发展壮大,且独具特色。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且气质独特的荆楚文化,是湖北人的精神家园。

荆楚文化发展大致经历六大时期。一是从远古到战国中期的异峰突起。荆楚文化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巫山猿人在三峡地带的活动。新石器时代,荆楚文化中心逐渐由西部山区向江汉平原转移,稻作农业文明则由南向北传播,初



步形成了荆楚文化的分布格局。炎帝神农在楚天荆地开创了华夏农耕文明。从夏初到西周,中原移民与江汉土著不断融合,形成具有创新精神的楚民族,建立充满生机的楚国,创造了代表先秦高峰的楚文化。二是从战国晚期到秦汉大一统下的转变。战国后期,荆楚文化不断遭到削弱。秦人进占荆楚地域后,秦文化逐渐在荆楚地区传播。秦汉全国一统格局下,荆楚文化先后作为重要的地域文化,在天下一统的文化建设和交流中,得以融合更新。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化,儒学在荆楚大地的传播不断加强,其影响力也逐步扩散。

三是从三国到五代的融合求新。荆楚历来处于中国南北军事要冲,三国至五代时期尤其如此,三国英雄们的智慧忠义代代相传。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后,北方两次大规模移民南迁,行政体制的分割和变化,移民文化与土著文化激荡,佛道儒学相互渗透融合。此时,最具中国特色的禅宗在此兴起,经济文化重心从中西部向东南轨移,标志着荆楚文化的融合、质变与创新。

四是从北宋到清中叶的性灵发掘阐扬。这一时期,荆楚地区得以全面开发。靖康之乱后北方移民南下和明清之际“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互动,使得文化大

融合。儒道佛进一步碰撞融合产生的理学于此演进嬗变,形成了经世济时的务实学风、民风。明中叶后,启蒙思想兴起,鄂东泰州学派将陆王心学发展到逻辑终点,李贽童心说和公安派、竟陵派以标举“性灵”耸动明代文坛。陆羽、慧能、毕昇、张居正、李时珍等名人辈出,荆楚文化创造活力、功绩倍显。

五是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转型创新。此时的荆楚大地,从汉口开埠到晚清湖北新政,从辛亥武昌首义到中共八七会议,从黄麻起义到武汉抗战,从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到湖北全境解放,湖北开内地革新风气之先,在社会转型、自救自强中涅槃新生。辛亥、北伐、抗战,使武汉(湖北)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基地(周恩来语)。湖北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形成了鄂豫皖、湘鄂赣、湘鄂西三大革命根据地,走出了红四方面军等重要革命武装,其中仅红安县就走出两位国家主席、200多位开国将军。

六是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荆楚大地更次进入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当前,湖北正打造中部地区发展新高地,成为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交

汇重要节点,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国光谷、北斗导航、高铁设计等,都闪耀着荆楚儿女的智慧创造和汗水荣光。荆楚文化薪火相传、中气十足、凤凰涅槃,更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迸发出无限生机活力。面向新时代,湖北吹响荆楚文化品牌,正努力实现“文化小康”、迈入“文化强省”。

荆楚文化楚色鲜明、气质独特、价值恒久远

荆楚文化以楚文化“六大特色创造”为代表,以湖北地域文化为内涵。采矿与冶炼、髹漆工艺、丝织刺绣是楚文化三大物质文化突出成就。楚国采矿与冶金技艺精湛,堪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楚青铜器制作,匠心独运、独领风骚,总体风格以纤丽清秀见长,凤纹流行,体现了楚人以凤为图腾的风格。楚国是漆源之乡,髹漆工艺高超。楚国漆器品种繁多、色泽绚丽、造型精巧、应用广泛,制造工艺均居当时世界之首。从生活用器到工艺品、娱乐用品、丧葬用品等一应俱全。楚人将油和漆合用,最显楚文化特色,这一工艺延续至今。战国

中期,楚国种桑养蚕规模和缣丝织帛水平已跃居列国之首。楚人将艺术情思萦绕在丝织品中,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增添了不少珍品。楚国织锦和刺绣最为艳丽,至今人们仍用“锦绣”代表美好。

老庄哲学、散文与楚辞、绘画乐舞是楚文化三大精神文化贡献。老庄哲学导源于楚人的思想传统,集中体现了楚文化的思想成果和认识水平的精髓,也把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主体思辨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楚国散文与楚辞兴盛,以活泼见长,纵横奔放,浪漫主义是其主流。《庄子》《离骚》并立,史称“庄骚”。屈原是楚辞的集大成者,他使楚辞全面成熟,成为文学史上不可企及的高峰和中国浪漫主义文艺创作的鼻祖。楚国艺术以绘画和乐舞最为突出。楚国漆画既注重表现生活、表现自然,也注重表现楚人自由浪漫思想和乐观进取的精神。楚国的乐舞水平高企,“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雅俗俱全,十分兴盛。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此外,楚文化在天文、数学、医学、建筑、交通等领域以及制度文化方面也有影响深远的建树。

楚文化独具特色并给后世中国以深刻影响。可以说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激荡与交融,形成了构筑华

夏文化的两大支柱,成为中华文明的渊源。如果说中原文化如雄浑的黄河,那么楚文化恰似清漪的长江。中原文化以黄帝为始祖,以龙为象征,以儒家为其学术干流;楚文化则以炎帝为先祖,以凤为图腾,以道家为其学术主流。华夏文化的南北两支各有千秋,龙凤呈祥,交相辉映,集中体现了周代文化的精华。

楚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也独树一帜。与她大致同时代的希腊文化相比,楚文化在许多方面如青铜冶炼、锻铸铁、丝绸、漆器等,或较之历史更为悠久;在音乐与哲学和文学方面,楚国和希腊各有所长,各有千秋,可以说是从不同道路上都登上了世界历史文化的光辉殿堂。

楚文化体现了荆楚文化的重要源泉,而荆楚文化如前所述,历史更为久远、内容更为丰富。其浪漫灵动、多姿多彩的特色内容还包括丰富而系统的上古神话和传说、集中而突出的巴土苗文化、“东神中佛西道”宗教格局及其文化、繁盛持久的戏曲文化、瑰丽灵秀的山水文化、灿若星辰的名人文化等。

厚实的荆楚文化,形成了正能量满满的湖北精神,是筚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谐诚信即追求和谐、为政以德、重在承诺的守信精神等。开放性、兼容性、进取精神以及浪漫主义特色和一元多样的价值取向等,是荆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本质特征,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国藩家书里的德与志

□ 高宏存

书海茫茫,人生有涯,喧嚣浮躁的世风让人们难以保留一个安谧宁静的读书园地。可在有限的读书时间里,阅读空间的打造,心灵地图的绘就,离不开明确的选择性,曾国藩的家书就是这种开卷有益、值得仔细研读的好书。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是宗圣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与胡林翼并称曾胡,又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在晚清深厚的政治影响力是毋庸赘述的。曾国藩生活于中国社会转型遭遇“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时期,但他一辈子以在京师翰林院做词臣时理学大师唐鉴赠送的四句话为人生目标:不为圣贤,即为禽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自觉以先贤圣人的理想要求自己,“研几”慎独中进德修业,学问上承续拓展桐城古文,创立“湘乡文派”,培养了有“曾门四弟子”之称且颇有文名的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黎庶昌等古文家,一生留下了诗文、简牍、笔记、日记、奏章、家书等各类文字一千五百多万字,而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他所写的家书。

他一生中不论如何繁忙,京城里读书修身治学为官,还是督军行船带兵打仗,总不忘记给兄弟子侄写信,讲求立志修身,探究学问做人,娓娓道来,总把金针度于人,以自己的精神成长的历程,为官做人的经验做例证,服人感人激励人。在《曾国藩全集·家书》所留下的1520封家信中,除了给祖父母、父母的几十封,绝大部分都是写给兄弟子侄辈的,在这些家书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个家族崛起的精神密码,一种绵延不断的独特文化传统。

崇德修匿：求学之根本

作为曾家的长子承重孙,曾国藩自觉地担负起教育子弟的责任。在家书中曾国藩把自己修身、治学、读书、交友、为官、治军等各个方面的体会心得,毫不保留地教给他们,他总能站得高远。

他注重修身立德,不放松日常德行方面的修养,更不忽视从日常小事

上对家人道德的教导。他教导家人要保留寒素门风,不可助长官宦子弟的习气,就要求他们出门不宜坐轿,行事要人情厚用钱薄,不可轻易鄙薄他人;教导子侄勤奋有恒,就要求他们从不晚起床做起。如此将抽象的道理具体化,远大目标同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连在了一起,非常容易为人领会和践行。这是曾国藩家书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也让家书读来平易亲切,毫无教训说教的嫌疑,人生的教训与道理也就容易为别人所接受。如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夜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凡人做一事,便需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患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它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坐垂老而百无一成。”

曾国藩家书的成功教育之道,还在于曾氏总能够从“为学”及“为人”的人生根本上入手,循循讲来,颇有感染力。他经常教导子弟,务必把读书与做人融为一体,要善于体察涵泳,在家书中曰:“古今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他在致诸弟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曾国藩在家书中对后辈的教诲,包含着对人生的根本、人生的目标的一些明晰认识和判断。

以志辅学：成学之通途

曾氏讲求读书论学最重立志,认为立定志向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基础。言及读书立志,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的书信中就特

别强调了为学先需立志的重要性:

“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处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初至京都,开始他从七品衔的翰林院检讨一职,他时时关心远在湘乡荷叶塘老家的正在为仕途拼搏的几位老弟,可是这几位老弟却来信诉说,因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擱,所以一定要到外面或教书或从师。实际上家乡的这几位兄弟真正渴望的无非是找了个借口托词,只是想到外面的世界寻些热闹。这一点曾国藩哪能不知,于是直接指出了问题与病灶所在,今日读来依然具有启发意义。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致诸弟的信中,干脆把立定志向作为读书的第一个条件: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与此相类似的言语议论,屡屡在写给子弟的书中出现,“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攀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慧,所由区矣。”这些话告诫青年人不可在读书的时候没有一个高远的目标和人生锤炼的厚重期许,否则是很难做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

曾国藩家书中包含着丰富的为人处世道理,其中关于立德、读书与立志方面的训诫更是对后人有着深远影响。曾氏家训培养了中国第一位驻英国公使曾氏长子曾纪泽、中国第一位留学国外取得学位的女性曾氏的曾孙女曾宝荪、第一任驻韩国公使曾氏孙子曾广钧等一门数代才子,其中蕴含的道理更成为名言警句影响着一代代读书人。



传统“女德”作为一种悠久而复杂的文化积淀,是研究中国传统伦理必须关注的重要内容。目前,社会性别和妇女史研究已渐成显学。明清善书中的妇女伦理,为考察和了解当时民间通行的妇女观以及妇女的实际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个窗口。要想了解传统伦理的生活实态,阅读古代流传至今的善书比阅读经典还要重要,通过善书了解“女德”是较为便捷的途径。善书是劝善书的简称,指宣讲伦理道理、劝人行善止恶的各种类型的通俗读物。重视道德教化是中华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善书类作品的起源很早,如出现于秦汉之际的《孝经》,就是一部用通俗语言阐发儒家孝道的著作。但善书的大量出现和广泛流布,则是宋代以后的事情。特别是到明清以后,善书的创作和传布日益繁盛,至清代已达到“遍于州县,充于衙衙”的程度。

善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生活于民间的乡绅和士人,他们自认为是传统道德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有“教化”之责,试图通过刊行善书以及在婚姻、丧葬、祭祀等方面推行规范化的仪节,将儒家伦理世俗化、生活化,或者说是将日常生活道德化、礼仪化。不过,善书的内容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干,但也广泛包融了佛、道二教的信仰观念和道德规范。可以说,善书所传播的内容,是为当时社会各阶层所普遍认可的一些思想观念和伦理规范。

妇女伦理是明清善书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思想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而保持妇女的从属地位,被认为是维持和谐家庭关系的重要因素,

因此,很早就出现了一些规范妇女行为的道德规条,如《仪礼·丧服》有“三从”(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随子)之说,《周礼·天官》有“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之教。从汉至唐,专门性的女教宣传品不断产生,较著者有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皇甫规的《女师箴》、贾充妻李婉的《女训》等。到明清时代,随着善书的兴盛,宣讲妇女伦理规范的专门性作品更是大量涌现,如吕坤撰有《闺范》、吕德胜撰有《女小儿经》、贺瑞麟撰有《改良女儿经》、陈宏模撰有《教女遗规》等。还有一些作品不著作者姓名,如《金科要约》、《女训》等。此外,各类综合性的善书中,也往往含有关于妇女伦理的内容。这些善书的内容有繁有简,但思想倾向则基本一致,都体现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道德精神。

本文仅以曾经在晚清民国风靡一时的《文昌帝君功过格》为例,对善书中的妇女伦理作一简要介绍。该书大约出现于雍正初年,伪托文昌帝君,下凡乩书传授,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它的文字虽然简约,但内容却十分齐备,几乎为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确定了善恶标准。该功过格的“闺门”部分,将妇女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分为九大类,详细列出了闺门功格85条、闺门过格123条,涉及妇女立身处世、待人接物、言行举止等各方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妇女角色的理想预期。

实事求是地说,该功过格所罗列



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
校园一角 侯国杰/摄

明清善书中的妇女伦理

□ 高寿仙

的妇女行为规范,部分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今天的道德建设中仍有其价值。比如在家庭关系方面,提倡孝敬长辈、助夫为善、教育子女、和睦亲族,提出“侍奉疾病无厌倦心”“相夫子成德成学”“赞助义方,教子成立”“姑嫂、姑姊、姐妹相爱敬”等;在个人修养方面,提倡持身端正,如“居处端庄”“慎举止”等;提倡纯朴勤劳的,如“勤俭同心作家”“早起夜眠,操作勤劳”等。

另一方面也无庸讳言,该功过格所罗列的妇女伦理,也有很多歧视性或禁烟性的糟粕。比如在家庭关系及个人自由发展等方面,要求妇女无条件地顺从丈夫,力图把妇女限制在家庭之内,并禁锢其精神自由及个体发展等。